

# 易地扶贫搬迁的促就业效果研究\*

——基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就业质量的双重视角

张会萍 罗媛月

**【摘要】**文章利用宁夏“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移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家庭劳动力配置得到优化升级,将安置方式细化分类后,所有安置方式的劳动力转移促进效果均显著。(2)搬迁后移民的就业质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区分安置方式后,搬迁距离较远并失去土地的移民就业质量下降较为明显。(3)易地扶贫搬迁对男性、学历居中及年龄较大的移民就业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总体而言,移民搬迁后,非农转移效果明显,但就业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工作要重点关注移民就业问题,并注重数量与质量的结合。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 劳动力非农转移 就业质量

**【作者】**张会萍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媛月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西”农村建设项目开始,搬迁扶贫一直是中国帮助地处环境恶劣地区的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2001年国家计委确定宁夏、云南、贵州、内蒙古为易地扶贫搬迁试点,正式提出易地扶贫搬迁这一概念。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易地扶贫搬迁成为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有效实现形式之一<sup>①</sup>。在随后的“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搬迁800余万人,其中700余万人实现脱贫<sup>②</sup>。易地扶贫搬迁将身处自然环境恶劣、自我发展能力极差的无法就地脱贫的贫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欠发达地区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政策影响与运行机制研究”(编号:72063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6/c11116851045.htm>),2015年10月16日。

② 《2019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论坛在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6/content\\_5440473.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6/content_5440473.htm)),2019年10月16日。

困群众搬迁出来,通过地理位置的转移帮助移民摆脱原有发展环境的限制,并辅以后续扶持政策,以此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帮助移民更有效地实现脱贫致富。但根据以往的研究,部分搬迁移民不同程度地存在生活成本过高(朱婷、何得桂,2018),可持续生计维持困难(邢成举,2016),甚至因入不敷出而重新陷入“城市贫困”的情况(邵秀军等,2017),这表明当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安置措施仍缺乏长效机制,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仍有待提高,而能促进移民在安置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就业。

易地搬迁通过空间的转移改变贫困户的外部发展环境,将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以土地为载体演化为依赖市场(汪磊、汪霞,2016),同时安置区大量的工作机会和丰富的就业种类为移民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就业选择,能够促使移民实现非农就业,以增加其非农收入(Roth等,2016),达到脱贫的目的。然而,对于移民的就业情况,现有文献分歧较大。部分学者认为,移民搬迁使移民从事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增加,导致移民家庭就业结构呈现非农化趋势,非农劳动力增加(黎洁,2016)。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迁入地产业发展状况较差,导致移民没有完成职业转型,仍以农业生产为主(李博、左停,2016)。此外,由于移民大多文化素质偏低,技能水平差,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梁伟军、谢若扬,2019),仅能从事一些低端工作,甚至无法就业。鉴于此,本文利用易地扶贫搬迁典型区域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农户调查数据,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就业质量提升两方面研究易地搬迁的促就业效果,并对搬迁安置方式进行分类,探究何种安置方式促就业效果更显著,以及搬迁对不同群体就业情况的影响。

## 二、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就业的影响机理

易地扶贫搬迁以政府为主导、农村居民自愿参与为主要方式,并根据安置区现实情况,采取以无土安置为主、多种安置方式并存的个性化安置方式,更加注重搬迁的精准并且尽量遵从移民意愿。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已基本告一段落,进入以帮助移民在安置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后搬迁时代”(王蒙,2019),帮助移民在安置区实现稳定就业是工作的重点(张涛、张琦,2020)。

### (一) 易地扶贫搬迁与劳动力转移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劳动力是否转移将取决于其是否能得到更高的报酬(张宽等,2017),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决策主要取决于对农业和非农收益的期望差异(洪炜杰、罗必良,2020)。随着近年来农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并且搬迁后距离农田较远,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加剧及耕种便利度的下降会促使农民向非农转移(陈帅、葛大东,2014)。此外,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了众多的非农就业岗位(丁守海,2014),高工资的拉力促使农户进入非农产业领域,获得比农业利润更高的工资性收入回报(刘魏、张应良,2018),同时政府通过组织技能培训或提供众多公益岗位解决就

业有困难群体,帮助移民实现非农就业(李长安,2018)。

## (二) 易地扶贫搬迁与移民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能够反映劳动者的综合就业情况(卢海阳等,2017),实现高质量就业是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维持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易地扶贫搬迁相当于一个助推移民外流的“跳板”,帮助移民跨越式完成了进城过程,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造成即使安置区有较好的资源,有较丰富的工作岗位,但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使移民无法胜任(王晓毅,2017),而原有农地或被回收或距离较远,使移民必须选择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性不匹配导致并非全部劳动力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造成移民就业质量下降。

## (三) 易地扶贫搬迁与不同群体就业质量

目前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就业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发现,在搬迁群体中外出务工人员呈年轻化趋势,并且男性移民外出务工的比例大于女性,同时移民就业情况与其受教育程度正相关(樊晔、任志军,2019);而对于就业质量的考察,已有文献大多以劳动力整体为研究对象,未对劳动力加以区分,并且鲜有文献就不同移民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讨论,但实际上劳动力之间在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差别,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甄小鹏、凌晨,2017)。因此,在劳动力异质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对不同移民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首先,搬迁移民大多为传统的农村家庭,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因此不论搬迁前后,移民家庭通常为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外出就业的概率很低。其次,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于外出务工这一生计方式的适应能力和工作搜寻能力逐渐减弱,同时企业的用人需求普遍年轻化,造成搬迁后移民的就业质量与年龄的负向相关。此外,教育被认为是劳动力提高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可以提升劳动力就业的概率及稳定性,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移民所能获得的工作质量的优劣存在天然差异,不论搬迁与否高学历的移民都会根据当地及自身情况谋求好工作。

#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全国的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宁夏是最早实施移民搬迁且规模较大的省份之一。从1983年开始共实施了6次政策性大规模搬迁安置工程,其移民搬迁历程与全国搬迁历程基本同步。宁夏的易地扶贫搬迁累计搬迁贫困群众100多万人,“十三五”期间共搬迁8万余人,各县(区)按自治区制定的搬迁计划分年度完成搬迁任务,并于2018年年底提前完成搬迁任务。

本文所用数据为宁夏“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实地调研数据。该调研于2019年

7~8月进行,覆盖大部分宁夏“十三五”安置点,共涉及12个区县49个乡镇105个村或小区,根据每个安置点的规模随机抽取10~20户移民作为处理组;在对照组的选择上,项目组根据处理组移民的5个迁出县,采取分层抽样的原则,每个县随机抽取3~4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0户左右农户。这次调研得到有效农户问卷947份,每份调研问卷包含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基础就业信息,如从事的职业是农业类型或非农类型等,以此衡量农户家庭中的农业经营及非农务工状况;同时对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就业信息进行详细统计,包括从事职业、工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拥

表1 调研地点及问卷数量

搬迁方式	农户数量		劳动力数量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未搬迁	279	279	159	181
已搬迁	668	668	483	725
合计	947	947	642	906

注:未搬迁为:宁夏原州区、同心县、彭阳县、海原县、西吉县。已搬迁为:宁夏兴庆区、利通区、灵武市、贺兰县、原州区、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平罗县、沙坡头区、盐池县。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有保险、更换工作频率等,用来进行就业质量的测算;在对就业质量研究中的劳动力样本定义方面,本文仅以夫妻双方为研究对象,将参与非农务工的劳动力纳入本文研究范围,不包括仅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最终得到有效劳动力样本搬迁前为642个,搬迁后为906个。具体调研地点及数据分布如表1所示。

(二) 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就业质量的度量

1. 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度量

针对移民劳动力非农转移情况,参照Mullan等(2008)、仇童伟和罗必良(2017)的做法,本文选择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占家庭劳动力的比例来度量,同时选择家庭农业经营人数占家庭总人数比值表示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情况,该比值越小说明劳动力非农转移情况越好(冯华超、钟涨宝,2019)。

2. 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度量

在移民就业质量方面参照李中建和袁璐璐(2017)、聂伟(2020)构建就业质量体系的做法,并结合移民就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运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综合反映搬迁移民的就业质量,主要包括工资水平、工作转换、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和移民主观评价。其中,工资水平用“月工资收入”表示;工作转换用“工作更换频率”表示;劳动合同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表示;社会保障体现移民就业的福利待遇状况,采用移民五险一金的缴纳情况反映;移民就业评价用“就业满意度”表示。

对移民就业质量指数的测量,参考多维就业质量指数(Leschke等,2014)。首先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chi_{ij}^{nor} = \frac{(\chi_{ij} - \min_j)}{(\max_j - \min_j)} \quad j=1,2,\cdots5 \tag{1}$$

$\chi_{ij}^{nor}$ 表示标准化后的各项指标, $i$ 为移民个体, $j$ 为上述5个测量指标,其中 $j=1$ 为月



工资收入,  $j=2$  为工作转换频率,  $j=3$  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j=4$  为五险一金缴纳情况,  $j=5$  为就业满意度。  $\max_j$  表示指标最大值,  $\min_j$  表示指标最小值。同时考虑到工作转换频率为负向指标, 本文用 1 减去标准化处理后的工作转换频率表示就业稳定性的反向指标。

对于权重的计算, 本文采用简单平均法计算就业质量指数:

$$Q_i = \frac{1}{5} \sum_{j=1}^5 \chi_{ij}^{nor} \times 100 \quad (2)$$

### (三)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本文运用双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探究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质量的影响。宁夏的“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采取自愿原则, 由农户判断自身家庭情况后决定是否参与搬迁, 因此农户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是“自主”选择的过程, 参与搬迁并非随机行为, 使用双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可消除样本的自选择问题。

本文首先进行 PSM 匹配, 定义 2015 年未搬迁但 2018 年已搬迁的移民为处理组, 2015 和 2018 年均未搬迁的农户为对照组,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 选择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培训状况、家庭抚养比为匹配变量, 运用核匹配的 PSM 匹配方法为搬迁移民(处理组)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未搬迁农户(对照组)。经 PSM 匹配后, 删除未参与匹配的样本, 可使组间差异大大降低。定义虚拟变量  $treated$  为政策虚拟变量, 处理组为 1, 对照组为 0, 同时设置时间虚拟变量  $post$ , 搬迁后为 1, 搬迁前为 0。

本文构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

$$Y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ed_i \times post_t + \sum_j \alpha_j \times Control + \gamm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Y$  是被解释变量, 表示移民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及就业质量, 当  $Y$  为劳动力非农转移情况时, 下标  $i$  表示家户, 当  $Y$  为就业质量指数时, 下标  $i$  表示劳动力个体, 下标  $t$  表示搬迁前后的时间(2015 和 2018 年),  $treated$  表示易地扶贫搬迁虚拟变量, 已搬迁赋值为 1, 未搬迁赋值为 0,  $post$  表示时间,  $\gamma_i$  表示村庄固定效应,  $\mu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Control$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alpha_1$  为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的净影响。

### (四)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中受访者大多为男性, 搬迁移民平均年龄为 38 岁, 未搬迁移民平均年龄为 42 岁。受访者中汉族家庭比例接近 60%, 与宁夏整体民族分布接近, 并且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平均为 5 年, 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总体而言, 搬迁移民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占家庭劳动力人数的比重在搬迁前后(0.389、0.53)均高于未搬迁家庭(0.292、0.371), 并且两组农户家庭 2018 年从事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均高于 2015 年。从农户家庭农业经营人数占比可以看出, 搬迁移民家庭从事农业经营的比重下降较多, 从 0.609 下降至 0.324, 而未搬迁移民家庭未发生较大改变。在就业质量指数方面, 两组农户均有所提高, 未搬迁农户提高较为明显, 从 82.981 上升至 92.739, 搬迁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搬迁前				搬迁后			
	处理组		对照组		处理组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劳动力非农务工占比	0.389	0.325	0.292	0.278	0.530	0.303	0.371	0.303
家庭农业经营人数占比	0.609	0.323	0.741	0.275	0.324	0.380	0.749	0.262
就业质量指数	81.837	23.767	82.981	20.861	83.695	26.714	92.739	21.353
月工资对数	7.865	0.466	7.754	0.515	7.799	0.523	7.677	0.571
合同签订	0.087	0.282	0.019	0.136	0.123	0.328	0.127	0.334
保险缴纳	0.056	0.230	0.019	0.136	0.070	0.256	0.061	0.240
工作更换频率	0.358	0.479	0.295	0.457	0.322	0.467	0.220	0.416
就业满意度	3.043	0.895	3.170	0.781	3.062	1.008	3.448	0.763
性别	0.768	0.422	0.818	0.387	0.694	0.461	0.729	0.446
年龄	38.064	8.859	42.340	9.152	38.916	9.022	42.188	9.276
民族	0.371	0.483	0.377	0.486	0.390	0.488	0.392	0.490
婚姻状况	0.942	0.234	0.899	0.302	0.942	0.234	0.884	0.321
受教育年限	5.451	3.977	4.918	3.865	4.899	0.452	5.105	4.013
培训状况	0.269	0.444	0.484	0.501	0.866	0.452	0.503	0.501
家庭抚养比	0.905	0.698	0.740	0.745	0.866	0.723	0.689	0.744

注:根据调研问卷整理。

农户的就业质量提高不明显,从 81.837 上升至 83.695。由于对照组和控制组的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十分必要。

#### 四、计量结果与实证分析

### （一）匹配效果的平衡性检验

表 3 描述了对样本进行核匹配的匹配结果。相比于匹配前,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态和家庭抚养比方面的差异均大幅度下降。本文的匹配变量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 5%,并且从 t 检验可以看出,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证明本文选取的匹配变量得当,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可以进行双差分分析。

## （二）双差分实证结果

### 1.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

表4模型1和模型2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基准回归,模型3和模型4分别为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虽然系数有所减小,但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加入影响移民就业的其他因素后结果依然稳健,模型5和模型6为先对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在进行双差分检验,结果变动较小,总体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移

民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移民家庭参与农业经营的比例降低,而参与非农务工的比例明显增加,劳动力呈现出非农转移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将移民安置到交通便利的地区,远离原有土地,降低了出行成本,增加了农业经营成本,同时政府在这方面进行奖补,如对于找到工作的移民每1万元收入奖励1千元现金,对于计划投资创业的移民给予政府无息贷款。此外,政府采用政企联合的方式为移民提供就业岗位并兴建扶贫车间,同时为困难群体开发公益性岗位,以上种种措施使移民的非农就业意愿增强。对于移民自身来说,搬迁至发达地区,周围原住居民的就业及致富意识也会对其起到带动作用。因此,外部环境

与移民自身的多重因素会促使移民向非农务工转移,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的劳动力转移效果显著。

2.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就业质量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就业质量显著下降,在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并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结果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易地扶贫搬迁为移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移民自身的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储备不能支持其完成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即使政府为其找到工作但移民无法胜任;同时由于移民更换了新的生活区域,原有的社会资本丧失,社会网络断裂,并且移民搬迁至安置区的时间较短,新的社会网络仍在建构中,因此移民很难通过人际关系获得较好的岗位。上述情形导致移民无法在短期内找到质量较高的工作,但生活压力迫使他们必须进行务工,于是造成移民劳动力向低端寻找工作,导致了就业质量的下降。

表3 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变 量	平均值		标准 偏差	标准偏差 减少	t 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性别					
匹配前	0.724	0.771	-10.8		-1.74*
匹配后	0.725	0.733	-1.8		-0.44
年龄					
匹配前	38.575	42.259	-40.5		-6.65***
匹配后	38.572	38.889	-3.5		-0.87
民族					
匹配前	0.382	0.385	-0.6		-0.10
匹配后	0.380	0.367	2.6		0.65
婚姻状况					
匹配前	0.942	0.891	18.5		3.28***
匹配后	0.944	0.951	-2.4		-0.73
受教育年限					
匹配前	5.120	5.018	2.6		0.41
匹配后	5.112	4.976	3.4		0.86
培训状况					
匹配前	0.279	0.494	-45.3		-7.61***
匹配后	0.278	0.266	2.4		0.64
家庭抚养比					
匹配前	0.881	0.713	23.2		3.82***
匹配后	0.883	0.873	1.4		0.3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变 量	DID				PSM-DID	
	家庭劳动力 非农务工占比	家庭农业经营 人数占比	家庭劳动力 非农务工占比	家庭农业经营 人数占比	家庭劳动力 非农务工占比	家庭农业经营 人数占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treat × post	0.107*** (0.021)	-0.290*** (0.018)	0.106*** (0.021)	-0.288*** (0.018)	0.106*** (0.021)	-0.286*** (0.086)
性别			-0.041** (0.018)	0.008 (0.015)	-0.043** (0.018)	0.010 (0.016)
年龄			-0.001 (0.001)	0.006*** (0.001)	-0.001 (0.001)	0.006*** (0.001)
民族			0.019 (0.027)	0.022 (0.026)	0.018 (0.027)	0.011 (0.027)
婚姻状况			0.025 (0.033)	-0.081*** (0.026)	0.025 (0.035)	-0.069** (0.025)
受教育年限			0.005** (0.002)	0.004** (0.002)	0.005** (0.002)	0.003* (0.001)
培训状况			0.021 (0.018)	-0.018 (0.016)	0.023 (0.018)	-0.016 (0.018)
家庭抚养比			0.087*** (0.013)	-0.132*** (0.012)	0.085*** (0.013)	-0.136*** (0.016)
家户数	947	947	947	947	634	634
样本数	1894	1894	1894	1894	1868	1868
R <sup>2</sup>	0.217	0.430	0.269	0.540	0.263	0.542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常数项估计值未列出；控制了村庄和年份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

(一) 基于不同群体的异质性检验

宁夏的“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根据安置区特征及移民意愿采取个性化安置措施及安置方式,不同安置方式的移民在安置区经济发展状况、产业发展特征及交通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时不同群体的移民对于移民搬迁的响应程度受个体特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移民进行分组、分群体讨论。

1. 不同安置方式对移民就业的影响

本文根据安置区有无分配土地及距原住地距离将宁夏的易地扶贫搬迁分为县外劳务安置、县内劳务安置、县外有土安置和县内有土安置 4 种方式。这 4 种安置方式由于区域位置及当地产业发展水平等原因,对于移民的安置措施也不尽相同。根据移民是否搬迁至县外距离较远的安置区将移民分为县内安置与县外安置,同时再根据政府所提供



住房是楼房或平房将移民分为县外劳务安置、县内劳务安置、县外有土安置和县内有土安置。其中两种劳务安置移民每户分得一套楼房,并在搬迁起两年内收回原有土地及宅基地,在安置区不再分配土地。县外有土安置是将安置村内原有空置住房进行回购并翻新,再提供给移民进行居住,并每人分得一亩水浇地,回收其原有土地及宅基地。县内有土安置仅为移民提供平房住房,回收原有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保留。由于安置方式本身和政策的不同,以及安置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导致不同安置方式对移民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表 6 可以看出,针对劳动力转移情况 4 种安置方式均显著推动了移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从系数可以看出,县外安置的转移促进效果大于县内安置,而对于劳动力在农业转出方面,除县内有土安置外,其余 3 种安置方式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主要是由于县内有土安置仅将移民进行就近安置,提供一套住房并保障了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表 5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 量	DID		PSM-DID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treat × post	-7.008*** (2.051)	-6.128*** (2.027)	-6.141*** (2.030)
性别		-2.434 (1.486)	-2.653* (1.489)
年龄		-0.048 (0.099)	-0.061 (0.100)
民族		5.729** (2.417)	5.897** (2.415)
婚姻状况		2.054 (2.910)	2.590 (2.989)
受教育年限		0.899*** (0.228)	0.906*** (0.228)
培训状况		1.265 (1.728)	1.232 (1.748)
家庭抚养比		-1.866 (1.238)	-1.884 (1.250)
样本数	1548	1548	1542
R <sup>2</sup>	0.155	0.183	0.185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常数项估计值未列出;控制了村庄和年份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不同安置方式对移民就业的影响

变 量	县外劳务安置	县内劳务安置	县外有土安置	县内有土安置
家庭劳动力非农务工占比				
treat × post	0.225*** (0.036)	0.114*** (0.020)	0.235*** (0.039)	0.068*** (0.022)
样本数	894	960	772	916
R <sup>2</sup>	0.291	0.258	0.310	0.276
家庭农业经营人数占比				
treat × post	-0.570*** (0.029)	-0.231*** (0.027)	-0.446*** (0.049)	-0.003 (0.017)
样本数	894	960	772	916
R <sup>2</sup>	0.695	0.583	0.607	0.561
就业质量				
treat × post	-9.758*** (3.645)	-3.108 (2.388)	-12.924*** (3.637)	-1.209 (2.861)
样本数	658	762	535	607
R <sup>2</sup>	0.177	0.225	0.314	0.253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常数项估计值未列出;控制了控制变量及村庄和年份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和交通便利度,原有土地仍属于移民家庭,给移民继续进行农业经营的可能,这部分安置移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外务工或农业经营中进行选择,从结果看,大部分移民选择兼业。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不同安置方式的差别较大。从表6可以看出,两种县内安置对移民的就业质量影响不显著,而两种县外安置的移民就业质量显著下降。这一结果说明虽然县外安置在外部就业环境、就业机会及人力资本市场需求方面均优于县内安置,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以及就业市场中同质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和就业歧视问题,给缺乏技能且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移民造成就业障碍。与县外安置相比,县内安置移民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要求也相对较低。由于搬迁距离近,移民适应速度快适应能力较强,同时借助乡镇城镇化的政策,在县乡政府大力打造优势产业,在发展乡镇经济的基础上,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与选择,因此县内安置移民的就业质量没有明显下降。

2. 分群体就业质量讨论

下面将移民按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进行分组,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对不同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

首先将移民按性别分组进行回归检验后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后男性移民的就业质量显著下降,而女性就业质量未受到影响,说明搬迁对于男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女性,并且是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在传统家庭中男性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保障家庭正常开销,男性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在面对比搬迁前更加严格的劳动力市场准入规则时,男性移民为避免失业而选择较差的工作以谋求收入;相比之下,女性移民由于需要操持家务和务农,在搬迁前大多没有工作,或仅在空闲时外出打零工,而在搬迁后较低的文化素质、亟须照料老人与孩子,也会阻碍其进入劳动市场,因此搬迁前后的工作状态未受到较大影响。

将移民按照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后发现,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的移民就业质量受到的影响最大,而未上学和高中以上学历的移民受到的影响不显著。对于未上学及学历相对较高的移民,或是由于劳动力素质较差而仅能从事低端工作,或是由于较高的知识储

表7 分群体就业质量讨论

变 量	男性	女性	未上学	小学或初中	高中及以上	29岁以下	30~45岁	46岁以上
treat × post	-8.475*** (2.289)	0.543 (5.018)	-1.352 (4.433)	-7.005*** (2.436)	1.865 (7.972)	-0.621 (6.770)	-6.393** (2.908)	-8.924** (3.730)
样本数	1134	408	396	1004	142	230	894	418
R <sup>2</sup>	0.211	0.267	0.352	0.232	0.463	0.418	0.229	0.314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常数项估计值未列出;控制了控制变量及村庄和年份固定效应;\*、\*\*、\*\*\*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备及技能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寻求高质量工作,外界环境的改变对这两部分移民影响较小。而中等学历的移民在原有较为宽松的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但就业要求提高且劳动力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后,原有就业基础不能支持其继续从事与之前水平相当的工作,迫使移民退而求其次选择相对较差的工作,导致就业质量下降。

将移民按年龄进行划分后发现,搬迁后青年移民的就业质量未受到影响,而中老年移民的就业质量显著下降。除上面提到的原有工作影响外,移民的适应能力也与其年龄呈反向关系,即年龄越大适应能力越弱。同时,青年移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而老年移民受过教育的人相对较少,因此呈现出年龄越大就业质量下降越多的趋势。

(二) 稳健性检验

1. 不同匹配方式的计量结果

本文运用 PSM-DID 法评估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质量的影响,有效处理了易地扶贫搬迁与移民就业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为增强本文结果的可靠性,防止由于不同的匹配方式造成样本量损失对结果的影响,本文更换不同的匹配方法,每一个结果均通过 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 次得到,结果如表 8 所示。从表 8 可以看出,更换匹配方式没有对本文结果产生影响,结论具有可靠性。

2. 易地扶贫搬迁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乎移民的生计,并且让移民获得更高的非农收入是扶贫的目标,因此本文将单独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工资水平的影响(见表 9)。从表 9 可

以看出,易地扶贫搬迁并没有促进移民工资水平上升,说明虽然搬迁后的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移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家庭非农务工人员明显增加,但其工资水平没有显著上升。增加移民非农收入的易地扶贫搬迁目标未达到,与移民无法寻求高质量的工作只能在工资

表 8 更换不同匹配方式

变 量	最近邻 1:1 匹配	半径匹配(0.001)	核匹配
家庭劳动力非农务工占比			
treat × post	0.107*** (0.024)	0.111*** (0.026)	0.106*** (0.021)
样本数	1686	1262	1868
R <sup>2</sup>	0.261	0.276	0.263
家庭农业经营人数占比			
treat × post	-0.286*** (0.019)	-0.287*** (0.023)	-0.286*** (0.018)
样本数	1686	1262	1868
R <sup>2</sup>	0.542	0.579	0.542
就业质量			
treat × post	-5.101** (2.168)	-6.148** (2.492)	-6.141*** (2.030)
样本数	1477	976	1542
R <sup>2</sup>	0.182	0.185	0.185

注:各项匹配结果均通过 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 次得到,其中最近邻匹配个数为 1:1,半径匹配的半径为 0.001,核匹配带宽为 0.06;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常数项估计值未列出;控制了控制变量及村庄和年份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9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工资水平的影响

变 量	移民工资水平
treat × post	0.014(0.047)
样本数	1542
R <sup>2</sup>	0.317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常数项估计值未列出；控制了控制变量及村庄和年份固定效应；\*、\*\*、\*\*\*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易地扶贫搬迁的促就业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显著促进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家庭劳动力配置得到优化;除县内有土安置外,其他 3 种安置方式的劳动力转移效应明显。县内有土安置在促进劳动力转入非农就业方面效果显著,而对于劳动力从农业经营转出方面效果不明显,更多的移民选择兼业。在就业质量方面,搬迁后移民的就业质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搬迁距离较远并失去土地的移民就业质量下降较为明显;易地扶贫搬迁对男性移民、学历居中及年龄较大的移民的就业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能够推动劳动力转移,优化家庭劳动力配置,帮助更多移民完成生计方式的转变,但移民整体的就业质量较差,搬迁后移民的就业质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且搬迁对移民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移民个体特征而存在一定差异。总体而言,搬迁后移民的非农就业情况在数量上增长明显,但质量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并且由于移民本身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偏低,其就业质量较差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业质量的高低对移民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的持续性起到关键性作用,高质量的工作对于移民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工作任重道远。因此,进一步帮助移民在安置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地解决其就业困难,需要政府高度重视移民在就业质量上存在的问题,不能因为数量上的达标而忽略质量的下降;努力为移民寻求相对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可通过协作、招标等方式与相关用人单位合作,为移民提供特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在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时应注重不同群体的差异,根据移民自身特征和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措施,并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为移民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使移民的技能与高质量就业岗位需求相匹配;为就业有困难群体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尤其是针对有务工能力的“5060”人员;建立动态化移民就业评估和追踪机制,持续关注移民的就业情况变化,让移民真正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

参考文献：

1. 仇童伟、罗必良(2017):《农地调整会抑制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吗?》,《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2. 陈帅、葛大东(2014):《就业风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较低的低技能部门就业有关,因此,帮助移民获得高质量工作是政府就业帮扶的当务之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宁夏“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调研数据,运用双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易



3. 丁守海(2014):《中国城镇发展中的就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4. 樊晔、任志军(2019):《脱贫攻坚背景下宁夏生态移民劳动力转移实证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5. 冯华超、钟涨宝(2019):《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了农地转出吗?》,《经济评论》,第2期。
6. 洪炜杰、罗必良(2020):《农地调整、跨期约束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学术研究》,第10期。
7. 黎洁(2016):《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9期。
8. 李博、左停(2016):《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9. 李长安(2018):《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就业扶贫的机制与措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6期。
10. 李中建、袁露露(2017):《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11. 梁伟军、谢若扬(2019):《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2. 刘魏、张应良(2018):《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差距研究——基于“离土”和“离乡”的异质性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3. 卢海阳等(2017):《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14. 聂伟(2020):《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农业技术经济》,第7期。
15. 邵秀军等(2017):《宁夏生态移民居住安置方式的减贫效果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4期。
16. 汪磊、汪霞(2016):《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探索》,第6期。
17. 王蒙(2019):《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8. 王晓毅(2017):《贫困治理:从技术精准到益贫发展》,《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
19. 邢成举(2016):《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陕省证据》,《改革》,第11期。
20. 张宽等(2017):《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组PVAR模型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
21. 张涛、张琦(2020):《新中国70年易地扶贫搬迁的就业减贫历程回顾及展望》,《农村经济》,第1期。
22. 甄小鹏、凌晨(2017):《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劳动异质性的视角》,《经济学(季刊)》,第3期。
23. 朱婷、何得桂(2018):《摆脱贫困: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质量提升机制研究》,《特区经济》,第5期。
24. Janine Leschke, Andrew Watt. (2014), Challenges in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uropean Job Quality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1):1-31.
25. Mullan, K., Grosjean P. and Kontoleon A. (2008),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9(1):123-133.
26. Roth V., Tiberti L. (2016), Economic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the Left-behind in Cambodi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3(11):1787-1805.

(责任编辑:朱 犁)